



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》略论*

□傅荣贤 房亮

摘要 清人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》虽以“佚文”为名,但并不从辑佚学的角度“以搜辑佚文为事”;而是从目录学的角度“推寻端绪”,努力复原《别录》的体制,其《七略别录佚文》也成为最接近《别录》本来面目的文本。具体而言,他将《七略》《别录》作为“二书”分别写录,揭示了两者一为校讎学、一为目录学的学科分殊;分析《别录》成书始末,显示《别录》存在两个版本,一是“随竟奏上,皆载在本书”的单篇叙录,二是“时又别集众录”而成的第二个版本。以此为据,可知第一个版本只有基于校讎分工的简单分类,第二个版本则完整地承绪了《七略》的分类体系。此外,姚振宗收录《战国策》等八篇相对完整的叙录,也反映他的灼见。然而,姚振宗也存在以荀悦《汉纪》“为《辑略》之文”、因没有认识到《汉志》班固注兼取《别录》《七略》而将班注全部移录为《七略》佚文等方面的不足。

关键词 姚振宗 《七略别录佚文》 目录学

分类号 G257

DOI 10.16603/j.issn1002-1027.2022.03.017

清人章学诚曰:“《艺文》为校讎之所必究。”所谓“艺文”,是指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(以下简称《汉志》),它是以刘歆《七略》为蓝本“删其要”而来,而刘向《别录》又是《七略》的前驱。因《别录》《七略》久佚,后人只能以《汉志》为据“求刘氏之微旨”“推阐向、歆术业”。章学诚本人在“《七略》《别录》之书久已失传”^{1}的前提下,也“仅就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参互钩稽而为之说”^{[2](8)},通过“论班”以达“宗刘”之旨趣。然而,《别录》《七略》《汉志》之间虽递相承袭,但毕竟不同。三书卷帙分别为二十卷、七卷和一卷,从一卷《汉志》“逆推”刘氏校讎学思想难免以偏概全、甚至指甲为乙。张尔田为孙德谦《刘向校讎纂微》所作《序》即曾致慨:“自来为校讎学者夥矣,莫高刘向氏。顾向之为学,则人多未之知。”^[3]“人多未之知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“文献不足征”。而《别录》《七略》的辑佚成果无疑有助于复原刘氏父子的思想面貌。例如,有学者“借助于《别录》佚文”“还原刘向‘校中秘书’的真实情形”^[4],所得颇多,结论令人信服。

在迄今所见洪颐煊《问经堂丛书》本、严可均《全汉文》本、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本、章太炎《七略

别录佚文征》等十家辑本中,“以姚振宗辑本最佳”^{[5](前言:4)};姚本是“质量最高的辑本”^[6];“其中以体例完善,辑佚文最多的姚振宗辑本为最佳”^[7]。姚本之荣膺“最佳”,固然与其佚文的数量与质量有关,但主要原因在于姚氏以恢复《别录》《七略》的原貌为本务,十分重视对原书“体制”“体裁”的还原。正如姚振宗自称,“二家辑本收集略备,特于本书体制未尽得耳”^{[5](11)};“严氏辑文荟粹略备,今兹所录,不过依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,移易其体裁而已”^{[5](86)}。姚氏《隋书经籍志考证叙》亦云:“近时为目录考证者,往往以搜辑佚文为事,其余皆不甚措意。不知佚文特考证之一端,不于一书之本末源流,推寻端绪,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,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之学,殊不然也。”^[8]

事实上,姚振宗也是辑佚诸家中唯一以目录学名世的学者,《清史稿·文苑列传》许其:“目录之学,卓然大宗。”^[9]姚氏以目录学家的身份肩荷辑佚之任,强调原书“体制”“体裁”的复原,突破了他家辑本争胜于佚文多寡、罗列片言只语的层次,充分体现了“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,极力整理,求还其书本来面

* 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“姚振宗《别录》《七略》辑本体例订误”(编号: CX11117)研究成果之一。

通讯作者:傅荣贤, ORCID: 0000-0002-0696-544X, 邮箱: frx99@163.com。



目”^[10]的辑佚学原则。

限于篇幅,本文专就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》对《别录》“体制”的复原及其得失试作分析。

1 区分《别录》《七略》

《汉志·总序》云:“每一书已,向辄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,录而奏之。会向卒,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,故有《辑略》,有《六艺略》,有《诸子略》,有《诗赋略》,有《兵书略》,有《术数略》,有《方技略》。”^[11](1701)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亦云:“(歆)复领《五经》,卒父前业。歆乃集六艺群书,种别为《七略》。”显见,“《别录》系由一篇篇叙录组成,仅涉及篇目,即每一书的目录”;而旨在“种别群书”的《七略》,“既编了目又分了类,形成了类似今天的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”“超越了一本本单个文献的具体性”^[12]。《别录》《七略》均为二书,故《隋书·经籍志·史部·簿录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·史部·目录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·史部·目录》皆分别著录“《七略别录》二十卷”“《七略》七卷”,两者一为“二十卷”、一为“七卷”,卷数之悬绝,反映了前者重在为“每一书”撰写叙录、后者聚焦于分类“群书”的不同旨趣。据李广龙统计,《汉志》颜师古注共引“刘向云”7条、“刘向《别录》云”21条,“刘歆云”1条、“刘歆《七略》云”3条^[13],亦说明刘向《别录》与刘歆《七略》虽然渊源甚密,但毕竟不同。然而,“马氏(国翰)《玉函山房》不分《录》《略》”^[5](85-86)。章太炎《征七略》亦认为,《别录》《七略》“非二书”,《七略别录》“除去叙录奏上之文,即专称《七略》耳”“固知世业联事,侔于《公羊》五世之传,谈迁、彪固二世之史。举一事以征作者,孰因孰革,无以质言矣”^[14](421)。因此,章先生只辑《七略别录佚文征》“一书”。

比较严本与马本可知,“严本佚文排列杂乱,不易寻检;马本依《汉志》排列,大体有序,易于检索”,但马本也存在“合《七略》《别录》为一而作统一编排”的问题^[5](前言:5)。而姚振宗则认为,《七略》《别录》作为“二书”不仅作者有别,编撰目标与体式亦不相同。所以,姚氏分别辑《七略别录佚文》和《七略佚文》各一卷,并在二书之前各有叙言,分述两者的成书、体例、价值和影响。我们知道,《别录》主要由一篇篇叙录组成,仅涉及到篇目,即一书目录,这和此前的《易经·序卦》《吕氏春秋·序意》《淮南子·要略》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等文篇性质相似。而旨在“种别”

的《七略》则既编了目又分了类,形成了类似今天的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,从《别录》到《七略》,大致反映了聚焦于“每一书”的校讎学向专志于“群书”的目录学之演进轨迹。姚氏以区别《别录》《七略》作为“还其书本来面目”的第一前提,不仅是出于辑佚学具体操作的需要,也反映了他对《别录》《七略》背后学术异同的清醒认识。

2 概述《别录》本末

与诸家径直写录辑文不同,姚振宗撰写三篇《七略别录佚文叙》冠于篇前,既是分析研究《别录》的专论,亦交待其辑录原则与体例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其中,《叙〈七略别录〉本末第一》凡18条,一方面引《汉书》的《成帝纪》《楚元王传》等文献以祖述《别录》之“本”;另一方面,又引《宋书》《晋书》《隋书》等文献以续述其“末”,较完整地揭示了刘向《别录》的生成及其后续影响,堪称溯源彻委,本末兼顾。如引《宋书·百官志》:“至成、哀世,使刘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。至于后汉则图籍在东观,有校书郎;硕学达官往往典校秘书,如向歆故事。”^[5](4)强调了“图书馆馆员”由兼职到专职的历史变迁。刘向父子“以本官”典事,说明他们都不是专职校书人员……真正涉及藏书的收集、保存、整理和利用——因而与“图书馆”工作名副其实的专职人员是“校书郎”^[15]。

当然,姚氏叙述“本末”,其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对《别录》本身的认识上。他说:“(刘向)卒于成帝绥和二年(前7),上溯河平三年(前26)受诏校书,首尾凡二十年。典校既未及竣事,则《别录》亦无由成书,相传二十卷殆子骏奏进《七略》之时勒成之,其曰《七略别录》者,谓《七略》之外别有此一《录》,当时似未尝奏御者也。”^[5](6)据此可知:

首先,“别录”有两个指称。一是刘向“随竟奏上,皆载在本书”的若干单篇叙录;二是“时又别集众录”的单篇叙录的结集。正如阮孝绪《七录序》所云:“昔刘向校书,辄为一录,论其指归,辨其讹谬,随竟奏上,皆载在本书。时又别集众录,谓之别录,即今之《别录》是也。子歆撮其指要,著为《七略》。”^[16](211-212)余嘉锡亦曰:“向所奏上之篇目旨意,载在本书者谓之录,编集别行者谓之《别录》”^[2](16)。简言之,“《别录》有两个版本”^[4]。

其次,关于《别录》的作者。“随竟奏上,皆载在本书”的单篇叙录,其作者主要是刘向,今存书录也



多署名“臣向”。对比“昔刘向校书,辄为一录”“子歆撮其指要,著为《七略》”明确指出责任者的文例可以推知,“时又别集众录”而成的第二个版本《别录》的具体责任者是佚名学者,至少,既不是刘向,也不是刘歆。

再次,关于《别录》《七略》的成书先后。基于“两个版本”的认识,可以推知:刘向“皆载在本书”的单篇叙录,其主体部分完成在《七略》之前,而“时又别集众录”而成的二十卷《别录》则成于《七略》之后。章太炎《征七略》所谓“《别录》先成,《七略》后述”^{[14](368)}之《别录》,只是“皆载在本书”的单篇叙录。而第二个版本的《别录》则成于《七略》之后。

最后,关于“七略别录”之称名。《隋志》、两《唐志》皆著录“《七略别录》二十卷”。姚振宗认为,称“七略别录”旨在强调“《七略》之外别有此一《录》”,这就解决了“别录”何以称为“七略别录”的问题。参以《汉志》所述刘向将单篇叙录“录而奏之”、刘歆“奏其《七略》”可知,姚振宗“《七略》之外别有此一《录》,当时似未尝奏御者也”的推测是令人信服的。但我们认为,“别录”之所以称“七略别录”,还在于强调二十卷“时又别集众录”而成帙的别行本,是依《七略》分类著录次第结集而来。亦即,在将“皆载在本书”的若干单篇叙录结集为一书时,是以《七略》分类体系(六略三十八种)为依据的,斯为《别录》称为“七略别录”的主要原因。因此,所谓“《七略别录》二十卷”是指第二个版本的《七略》;作为“皆载在本书”的第一个版本的《别录》,是没有分类的,详下。

基于《别录》的两个版本及其与《七略》成书先后的认知,可以很好地解释“《别录》中亦有附记之文,在奏上诸书之外者”^{[5](9)}等看似矛盾之处。例如,隋人萧该《汉书音义》引《别录》“扬雄《经目》有《玄首》《玄冲》《玄错》《玄测》《玄舒》《玄营》《玄数》《玄文》《玄挽》《玄图》《玄告》《玄问》,合十二篇”^{[5](9-10)},而据《汉书·扬雄传》“哀帝时……雄方草《太玄》”^{[17](869)}。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(前8),不可能见到扬雄于哀帝时(前8—前1在位)“方草”的《太玄》。可以肯定,萧该所引《别录》当是结集而成的二十卷本《别录》,它产生于《七略》之后;而非产生于《七略》之前的刘向“随竟奏上,皆载在本书”的单篇叙录。章太炎认为:“盖《太玄》既未入录,逮子骏卒业,姑附其目于儒家之末……《七略》奏上虽在汉世,逮及亡新,校书未已。”又曰:“《七略》既成,后稍

增注,故得下逮雄卒矣。”^{[14](368)}但萧该所引为《别录》而非《七略》,“逮及亡新,校书未已”亦于史无征,章氏曲为之说,实因没有明白《别录》有两个版本所致。张伟认为:“因为扬雄写《太玄》时,刘向已死,不可能见到并著录《太玄》;但是,刘歆是见过《太玄》的,所以刘歆在刘向死后对《别录》进行增订、完善的过程中,就将这些篇目添加到了《别录》中,从而萧该得以引用,但是萧该未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,径引作‘刘向《别录》’,遂令后人不解其意。”^[18]这实际上是重复了章太炎的错误认识。并且,正如上文分析,“时又别集众录”的责任者并非刘歆。

3 关于《别录》的《辑略》

《别录》之《辑略》问题的核心在于:第一,《别录》到底有无《辑略》?第二,如果有,其具体内容是什么?这也是学界长期聚讼的问题。

从诸家辑本来看,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本、张选青《受经堂丛书》本都辑有《别录》的《辑略》佚文,顾观光《武陵山人遗稿》分《别录》《七略》为二书,“《七略》有‘辑略’应无问题;《别录》是否有‘辑略’,似还游移不定”^[19]。

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叙·叙新编〈七略别录〉第三》曰:“荀悦《汉纪》称:刘向典校经传,考集异同,云‘《易》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’,以下云云并与《汉书·儒林传》《释文·叙录》相同,而与刘中垒叙奏之文颇不相合,反复推求,知为《别录》中《辑略》之文。荀氏节取而为《汉纪》,班氏取以为《儒林传》,陆氏取以为《(经典释文)叙录》,各有所取,亦各有详略,而其为《辑略》之文,审矣。二家辑本皆置不录,今校补缺遗,分条排比,还《辑略》之旧。”^{[5](前言:4)}姚氏认为《别录》有《辑略》,且主要保存在荀悦《汉纪》中。其《七略别录佚文》所辑《辑略》佚文35条,除了无所系属的“讎校”“汗青”2条佚文之外,其余都是录自《汉纪》。但范晔《后汉书·荀悦传》曰:“帝好典籍,常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。乃令悦依《左氏传》体以为《汉纪》三十篇。”^[20]荀悦《汉纪》的蓝本是班固的《汉书》,而与刘向《别录》无涉。荀悦《汉纪序》也指出,《汉纪》是“抄撰《汉书》,略举其要”而成^[21]。清儒王鸣盛亦云:“观其书盖专取班《书》,别加论次,断之,而班《书》外未尝有所增益,玩《自序》可见,而其间或与班《书》亦有小小立异者,在悦似当各有所据。”^{[22](199)}因此,《汉纪》“其为《辑略》之文”的观



点并不成立。而一旦否认了《汉纪》与《别录》的直接关联,《别录》如果有《辑略》的话,就只剩“讎校”“汗青”等“于六艺诸书无可系属”的寥寥“二事”^{[5](前言:4)}了。

我们认为,《汉志》“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,故有《辑略》,有《六艺略》,有《诸子略》,有《诗赋略》,有《兵书略》,有《术数略》,有《方技略》”^{[11](1701)},《辑略》是《七略》的重要组成部分,《七略》将图书分为六大类但命名为“七略”,正是虑计《辑略》的结果。但就《别录》而言,作为“每一书已”“随竟奏上”的单篇叙录,肯定没有《辑略》;“时又别集众录”的二十卷本《别录》作为单篇叙录的结集,在《七略》仍然在世的情况下,复写出与《七略》相同的《辑略》意义也不大。因此,那种认为“《别录》也以辑略冠首,故又称《七略别录》。《别录》与《七略》的辑略乃同一篇书,不得有异”^[23]的认识,是值得商榷的:首先,《别录》称为“七略别录”乃因“时又别集众录”的第二个版本《别录》是以《七略》分类体系为框架结集而成,而非“以辑略冠首”所致;其次,“时又别集众录”的《别录》据《七略》分类体系结集,没有必然移录“同一篇书”的《辑略》。

正如邓骏捷指出:“《别录》辑本中有《辑略》,则恐非原貌。”^{[5](前言:5)}笔者也倾向于认为《别录》没有《辑略》,也就谈不上据《汉纪》“校补缺遗,分条排比,还《辑略》之旧”的问题。那种认为“马本《辑略》,只有寥寥三条,姚本据荀悦《汉纪》增入三十多条,立说精确,尤发前人所未发”^[24]的看法,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。《汉纪》“专取班《书》”“班《书》外未尝有所增益”,并没有参考利用刘氏《别录》;剩仅“寥寥”的“校讎”“杀青”二条,姚氏疑其“似例言,又似注文”,因“于六略诸书中无可系属”而“录附于《辑略》之末”^{[5](9)},佚文本身的匮乏亦说明《别录》并无《辑略》。

4 关于《别录》的分类

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叙·叙新编〈七略别录〉第三》曰:“《艺文志》所载书名、篇数、卷数本诸《七略》,《七略》本诸《别录》,无大异也。严辑本不标书名,间有以小字注出者,亦多未备,亦有先后次之处。马本依《汉志》分篇标目,颇得体裁,而与辑文连属不分别,于簿录之体未合,亦使读者无头绪可寻。今据《汉志》一一标目于佚文之前,别行拾写为之纲

领,无佚文者不虚列也。”^{[5](10)}姚本以严本、马本为基础,但不取马氏混排之体,而是分辑《七略别录》佚文与《七略》佚文各一卷。进一步,姚振宗又据马本依遵《汉志》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之序排列佚文,所谓“马本分著篇目,较为明析,今从其例”^{[5](6)},实际上是默认《别录》也是分类结集的,其类别体系同于《七略》,并被保存在《汉志》中。可以肯定,姚振宗对《七略》《别录》的分殊以及《别录》依《七略》分类结构而结集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但从《别录》两个版本的角度来看,可以从下述三个层次具体分析《别录》的分类问题。

首先,作为第一个版本的《别录》只有基于校讎分工的简单分类。

我们知道,刘向领衔校书有明确的分工,《汉志》所谓“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,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,太史令尹咸校数术,侍医李柱国校方技”^{[11](1701)}。余嘉锡据此认为,“向、歆类例,分为六略”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“因校书之分职”^{[2](128)}。

因此,刘向校书团队出于分工的需要而形成简单的类别应属事实。但是,刘向“每一书已”“录而奏之”的单篇叙录是以具体文献为对象的,因而谈不上系统分类。从《汉志》来看,其兵书略“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”^{[11](1762)}所“省”之“重”主要是《七略》中与诸子略相重复的文献,而出现重复著录现象的主要原因正是因分职校书、不相为谋所致。诚如王重民指出:“任宏校书兵都是根据他专官典守的现实传本,他虽说和刘向、刘歆一起校书,并没有发觉互相重复的问题,所以并没有互相取得联系。”^{[1](19)}

其次,《七略》以分类为职志,建构了系统的分类体系。

从《七略》来看,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“歆乃集六艺群书,种别为《七略》”^{[17](406)}强调“种别”;《北堂书钞》卷九十九《刘歆集序》“歆字子骏,受诏与父向校众书,著《七略》以剖判百家”^[25]强调“剖判”;阮孝绪《七录序》“歆总括群篇,奏其《七略》,后汉兰台犹为书部”^{[16](212)}和《隋志·序》“(东汉校书郎班固、傅毅等)并依《七略》而为书部”^[26]强调“书部”,皆旨在突出《七略》的分类性质,其具体分类结构与框架保存在《汉志》“六略三十八种”(六大类、三十八小类)中。《七略》以“种别”“剖判”“书部”的分类见长,适可反证第一个版本的《别录》并不以分类为其特色。

最后,第二个版本的《别录》被称为“七略别录”,



正因承绪了《七略》的分类体系。

如上所述,“时又别集众录”的二十卷《别录》是根据《七略》体系“别集众录”而得,而这正是《别录》称为“七略别录”的一个主要原因。因此,第二个版本的《别录》与《七略》共享一致的类别体系——尽管,《别录》更加重视针对“每一书”的叙录,而《七略》则尤其重视分类。

因此,姚氏“据《汉志》一一标目于佚文之前”而得的《七略别录佚文》,反映的是第二个版本(而不是第一个版本)《别录》的面貌。就此而言,其《快阁师石山房丛书》所收七种目录学著作中,列《七略别录佚文》为第一,列《七略佚文》为第二,实际上是颠倒了两者的伦叙。

5 关于《别录》的叙录

二十卷《别录》的主体内容是针对“每一书”的叙录,即“众录”的结集。从现存佚文来看,叙录主要包括两大部分。

第一,相对完整的八篇叙录。

今存相对完整的叙录计八篇,学者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,有各不相同的处理方式。章太炎《七略别录佚文征·叙》曰:“《管》《晏》《列》《荀》《山海经》《说苑》诸书叙录具在者,虽他书征引皆不疏录,独取韦昭、颜籀所引与佚文当举书目,以起本者,始一二遑书之。”^{[14](359)}其《七略别录佚文征》并未收录相对完整的八篇叙录。而清人洪颐煊《经典集林·总目》曰:“今《战国策》《山海经》《说苑》《管子》《晏子》《列子》《邓析子》《孙卿子》俱有刘向奏,疑亦在《别录》。以附专书,不复录入卷中。”^[27]“承袭洪本”的严可均本^[28]亦收《战国策》《管子》《晏子》《孙卿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列子》《邓析子》《关尹子》《子华子》(后二书严氏皆注“依托”,疑其为伪)以及《说苑》《高祖颂》等残文。可见,洪、严二本皆非章太炎先生所云“他书征引皆不疏录”者。但洪、严二本“以附专书,不复录入卷中”,亦即,将它们列在“刘向集”下,而不是列在《别录》的相关条目之下。总之,章太炎未收此八篇叙录,而洪、严二本虽收,但列在“刘向集”下。

相比而言,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叙·叙新编〈七略别录〉第三》曰:“《别录》中叙奏全文今仅存《战国策》《晏子》《孙卿子》《管子》《列子》《韩非子》《邓析子》及刘秀《上山海经表》,凡八篇。而《晏子》《孙卿子》《列子》三书叙奏之前,具载篇目,《艺文志》所谓

‘条其篇目,撮其旨意’,其原书体制盖如此,尤为不可多得之鸿宝。又有《关尹子》《子华子》《于陵子》叙各一篇,后人伪托。《关尹子》见《七略》道家,《子华子》《于陵子》,《七略》并无其书,何有于叙?前人论定久矣,今并不取。”^{[5](9)}今按,绥和二年(公元前7),汉成帝病故,刘欣继位,是为汉哀帝,次年(公元前6)改元建平,刘歆出于避讳的目的(欣、歆音同)而改名为刘秀。这里,姚振宗既收录八篇叙奏(这与章太炎不同);又将它们移录为《别录》佚文(而非洪颐煊、严可均录为“刘向集”的佚文),有助于对《别录》的认识与把握,其识见明显高于章太炎以及洪、严二家。

值得指出的是,八篇叙奏中包括刘秀(即刘歆)《上山海经表》。姚氏认为:“刘歆别有《七略》,此奏不入《七略》者,以其体当归《别录》也。”^{[5](78)}即将署名刘秀的《上山海经表》亦列在《别录》(而“不入《七略》”),诚得其例。一般认为,“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《七略》”,但实际上刘歆是刘向校书团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,其《上山海经表》作为完整的叙奏,应在《别录》之中,而不是在以“种别”见长的《七略》之中。

并且,姚振宗认为“《晏子》《孙卿子》《列子》三书叙奏之前,具载篇目”^{[5](9)}(今按,刘秀《上山海经表》亦是“叙奏之前,具载篇目”的),这四篇相对完整的叙奏,反映了“条其篇目,撮其旨意”的一书目录的本旨,具有重要的目录学史意义。余嘉锡“目谓篇目,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”的著名定义,正是据“具载篇目”的叙奏而来,余先生认为《孙卿书录》等“前列篇目,后论旨意,合于班固之说,此真当时奏上之旧式也”。也正是基于姚氏佚文的学术价值,余嘉锡认为,诸家“惟姚振宗所辑《别录》,将此诸篇并已收入,其识高出前人远矣”^{[2](16,21,24)},充分肯定了姚氏将八篇叙奏录列为《别录》叙奏的学术意义。

关于现有叙录中的伪篇,王国维认为:“《关尹子》《子华子》《于陵子》皆有刘《录》,《邓析子》有歆《录》,皆伪。”^[29]但学界一般多认为《邓析子》书录为真。在对这些伪托书录的处理上,张涤华指出:“《关尹子》《子华子》《于陵子》诸书叙录,全行删去,足见马氏是有鉴别眼力的,《邓析子书录》没有收入,也可以看出态度的矜慎。”^[24]同样,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》对这些伪篇也“今并不取”。邓骏捷则认为,姚振宗“对于《关尹子叙录》《子华子叙录》等被疑为伪托的叙录,一概不录,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,这些叙录毋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”^{[5](前言:5)}。从保留史



料的角度来看,姚振宗不录伪篇,反而不如邓骏捷校补本以“附录”的形式存留更具合理性。

第二,关于诸书“众录”的片言只字。

诚然,二十卷《别录》的主体内容是“众录”,即每一书的叙录。但相对完整的叙录只有上述《战国策》等八篇,其余则另有残膏剩馥的片言只语见存。姚振宗认为:“《艺文志》班氏注亦本诸《七略》,《七略》本诸《别录》,总不出《录》《略》二书之外。今取其与辑文相关涉者,仍以小字注出,使略有本末可见。”^{[5](10)}基于这一认识,姚氏主要以《汉志》班固注为依据,辑录诸书“众录”的片言只字,但注意删除班注接续之辞。如小学类《史籀》十五篇班注:“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,建武时亡其六篇矣。”^{[11](1719)}建武(25—55)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年号,“建武时亡其六篇矣”为班氏所加,并非《别录》原文,故《七略别录佚文》仅保留“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”^{[5](37)}的内容。反观严可均、马国翰二家皆未删削班固所加之“建武时亡其六篇矣”八字,明显不如姚氏精审。又如,严、马二家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索隐辑“《王制》,文帝所造书也,有《本制》《兵制》《服制》”^{[5](45)}。姚按:“二家皆以此《王制》即《礼记》之《王制》,故编入礼类,其实非也。前人尝辨之,今姑移列于此。”^{[5](45-46)}“此”指诸子略儒家“《孝文传》十一篇”,姚氏据“前人”王鸣盛的研究成果^{[22](143)},修正了二家的错讹。可见,姚振宗对诸书“众录”片言只字的佚文处理,更加符合《别录》叙录之情实,从而也超出了严、马诸家的认知。

另一方面,姚氏对班注的处理亦有可商之处。兹以易类为例试作分析。易类班固小注概有8条:

《易传周氏》二篇。字王孙也。

《杨氏》二篇。名何,字叔元,菑川人。

《蔡公》二篇。卫人,事周王孙。

《韩氏》二篇。名婴。

《王氏》二篇。名同。

《丁氏》八篇。名宽,字子襄,梁人也。

《古五字》十八篇。自甲子至壬子,说《易》阴阳。

《淮南道训》二篇。淮南王安聘明《易》者九人,号九师说。

上述8条班注,姚氏悉数移录为《七略》佚文;而只将《韩氏》二篇中的“名婴”一条移为《别录》佚文。但从《淮南道训》来看,《文选·任彦升〈齐竟陵文宣

王行状》注》引《七略》曰:“《易传淮南九师道训》者,淮南王安所造也。”《初学记》卷21、《太平御览》卷609皆引《别录》曰:“臣向所校讎中《易传淮南九师道训》,除复重,定著十二篇。淮南王聘善为《易》者九人,从之采获,故中书署曰《淮南九师书》。”^{[5](22)}相较而言,班注“淮南王安聘明《易》者九人,号九师说”^{[11](1703)},应来自《别录》“为《易》者九人”而不是来自《七略》“淮南王安所造”。以此审之,班注主要“是据刘向《别录》而非刘歆《七略》而采择材料”^[30]。至少,不是完全以《七略》为取材。这样,姚氏将班注悉数移录为《七略》佚文,就值得反思了。

6 结语

姚振宗《七略别录佚文》兼具辑佚学与目录学的双重性质。从辑佚学的角度来看,姚氏辑佚虽存在取材等方面的问题,但他注重细节考订,态度比严可均、马国翰二家更为审慎。从目录学角度来看,姚振宗以目录学家身份从事《别录》辑佚,针对“(严、马)二家辑本收集略备,特于本书体制未尽得耳”^{[5](11)}的现实,他并不争胜于佚文的多寡,而是重视对《别录》“体制”的还原,其《七略别录佚文》也事实上成为公认的最为接近《别录》原貌的文本。藉此,人们对于《别录》与《七略》的关系问题以及《别录》之《辑略》、分类、叙录等问题都有了较为可靠的认知,反映了姚氏作为目录学家超迈其他辑佚家的远见卓识。而在姚氏之前,“人们对《别录》《七略》的体制的认识含混不清,更没有谁来研究刘向父子的校书义例”“目录学界能够清楚地认识先秦两汉目录学发展的成就,不能不归功于姚振宗”^[6]。

参考文献

- 1 章学诚.自序[G]//章学诚.校讎通义通解.王重民,通解.上海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,2009.
- 2 余嘉锡.目录学发微[M].成都:巴蜀书社,1991.
- 3 张尔田.序[G]//孙德谦.刘向校讎纂微.四益宦刊本癸亥年(1923):1.
- 4 傅荣贤.刘向“校中秘书”相关问题考论[J].图书馆,2012(2):44-48.
- 5 刘向,刘歆.七略别录佚文 七略佚文[M].姚振宗,辑录.邓骏捷,校补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- 6 王承略.试论姚振宗的《别录》《七略》辑本[J].古籍研究,1995(1):26-29.
- 7 王连龙.刘向《别录》佚文辑补[J].图书馆理论与实践,2009(11):59-60.



- 8 姚振宗.隋书经籍志考证[M].师石山房丛书本.上海:开明书店,1936:8.
- 9 赵尔巽.清史稿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:13398.
- 10 梁启超.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1:323.
- 11 班固.汉书(第六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12 傅荣贤.《汉书艺文志》研究源流考[M].合肥:黄山书社,2007:3.
- 13 李广龙.《汉书》颜师古注引《别录》《七略》佚文笺释[J].咸阳师范学院学报,2009(3):22-26.
- 14 章太炎.章太炎全集(三)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.
- 15 傅荣贤.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史[M].合肥:黄山书社,2016:110.
- 16 阮孝绪.七录序[G]//昌彼得.中国目录学资料选辑.台北:文史哲出版社,1999.
- 17 班固.汉书(第一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- 18 张伟.姚振宗、章炳麟两家《别录》辑本异同及《别录》体制考论[J].山东图书馆学刊,2016(1):82-87.
- 19 李解民.顾观光的《别录》《七略》辑本[J].社会科学战线,1999(2):315-324.
- 20 范晔.后汉书(第一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:599-600.
- 21 荀悦.汉纪序[G]//荀悦,袁宏.两汉纪(上册).张烈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17:1.
- 22 王鸣盛.十七史商榷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.
- 23 钟肇鹏.七略别录考[J].文献,1985(5):59-72.
- 24 张涤华.《别录》的亡佚及其辑本:《别录》考索之二[J].阜阳师范学院学报,1982(2):1-10.
- 25 虞世南.北堂书钞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89:377.
- 26 魏征,等.隋书(第四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906.
- 27 洪颐煊.洪颐煊集(二)附洪坤煊集附洪震煊集[M]//曾学文,徐大军.清人著述丛刊(第一辑).扬州:广陵书社,2019:336.
- 28 胡宗华.《别录》《七略》辑本考论[J].古籍整理研究学刊,2019(1):54-59,72.
- 29 王国维.汉书艺文志举例跋[G]//陈国庆.《汉书艺文志》注释汇编.北京:中华书局1983:243.
- 30 孙振田.试论姚振宗《七略佚文》的误失[J].中南大学学报,2014(4):226-231.

作者单位:扬州大学文学院,江苏扬州,225002

收稿日期:2021年12月4日

修回日期:2022年1月4日

(责任编辑:支娟)

The Brief Discussion on Yao Zhenzong's *Lost Articles of Qilue Bielu*

Fu Rongxian Fang Liang

Abstract: Although the work by Yao Zhenzong of the Qing dynasty is named after “lost articles”, it didn’t “search for the collection of lost articles”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ilation; instead, it w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bliography to “seeking clues” and trying to restore the system of *Bielu*. He wrote the *Qilue* and the *Bielu* as “two books” separately, established the chapter framework of the *Bielu*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of the *Hanzhi*, and listed the “Warring States Policy Records” as the narrative of *Bielu*, which shows Yao’s outstanding insight beyond other compilatists. Its *Lost Articles of Qilue Bielu* has also become the text closest to the true face of the *Beilu*, which provides a more reliable premis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*Bielu* and the *Qilue*, as well as the *Bielu* of the *Jilue*, classification, and narrative. However, Yao Zhenzong also had some deficiencies in using Xun Yue’s *Hanji* as the text of the *Jilue* and transferring all the Ban Gu notes of the *Hanzhi* to *Qilue* (instead of the *Bielu*).

Keywords: Yao Zhenzong; *Lost Articles of Qilue Bielu*; Bibliography